

上梁馒头

回味

强子

我有过参与建造木结构房屋的经历。

1966年，我小学毕业后，无学可上，隐隐感觉，学门谋生的手艺，将来总不会没饭吃。母亲想到了邻居——年近花甲的木匠，我从小就唤他“阿公”。在母亲的再三请求下，阿公虽嫌我年龄尚小且长得瘦弱不宜做木工这种体力活，最终还是破例收下我这个“半拉子”徒弟。年前阿公已收了个初中毕业生徒弟。

刚过完元宵节，我们师徒俩带着简单的铺盖，挑着全套工具，步行两个多小时，来到甬江边邻近冰厂的一个村子造房子。

建造三间屋的木材，东家已根据用途分别堆放在屋基地上。阿公首先在一处平整的石灰墙上放好样（房屋的结构图），然后选择每一构件合适的材料，我和师兄则按照阿公提出的要求和注意事项进行操作。选定的屋柱或桁条先架到“三脚门”上，用斧子砍创子刮进行表面修整后，阿公拿着墨斗、肩上勾着鲁班尺“弹”上中心线，再以中心线为基准，画上榫或卯。从一根毛胚木头到一件完整构件，需经过数次砍、刨、锯、凿、拉来挪去多道工序方能完成。看到阿公和师兄紧手抢活的干劲，我也边干边学用尽全力不敢懈怠，一天工作10小时左右。晚上与阿公“比邻”躺在用红稻草铺就的地铺上，阿公耷拉着眼皮，叮嘱我们要秉承惜物的美德，每块木材物尽其用，做生活要用心，方可对得起东家。念着念着，他就睡着了。我则在时高时低的呼噜声中思念家和母亲，希望明日天亮得晚些，能多睡一会儿。早上被阿公从睡梦中唤起，我揉着惺忪的睡眠跟着去吃早餐，紧接着就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
工程过半，东家就与阿公商量上梁的事，并选定吉日良辰。

上梁那天，阿公起大早来到工地，对每个环节进行最后的检查。前来帮忙的东家亲朋，个个是壮劳力。阿公任总指挥，石匠、泥工协助配合，师兄和我跑龙套。一阵有序的忙碌后，屋架像搭积木一样竖起来了。阿公腰系围身布襁，后腰别着斧子，脚穿圆口千层底布鞋，在高高的横梁间踏着虎步巡视，专注的目光犹如舞台上的聚光灯，还不时在哪个部位敲上几下，自有一股匠人气势。

庭院前早已聚集了前来贺喜的众乡亲，大人们吸着东家递上的“红鹰”牌香烟，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房屋的朝向、建筑材料的品质、

东家父亲的勤劳、女主人持家有方以及世代相传的慈孝家风。孩子们则起着哄在人群中穿梭嬉闹，有节奏地嚷嚷着乡间俚语：敬重师傅敬重屋，敬重父母敬重福……上梁喽！阿公虔诚地将两块红布用铜钱加钉子分别钉在栋梁的两端，两头拴上绳索。在轰然炸响的鞭炮声中，两个壮汉同步向上拉绳子，把栋梁送到屋柱顶端人卯落榫。阿公在上面“咣咣”敲了两下，以示栋梁正式就位。

抬着一元宝箴馒头的泥工骑到梁上喊：抢上梁馒头哇！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人丁兴旺……边吆喝边往各个方向抛馒头。东家有备而来，拎起围身布襁的两只角，“抢”到了第一个上梁馒头，像兜到金娃娃般呵呵乐着闪到一边。一群孩子精灵如猴，欢呼着一拥而上，挤成一堆，扯成一团。孩子们兴奋得两眼放光，抢到一个，又被挤掉一个，笑骂声响成一片，乐得长辈们也哈哈大笑。滚到水注里的馒头也被孩子捡起，在灰扑扑的衣服上胡乱蹭几下，照样嚼得津津有味……

该吃午饭了，东家一脸喜气迎候在摆满酒菜的八仙桌旁，工匠们搓着树皮般粗糙的手互相谦让着，年长的阿公和石匠师傅被东家殷勤地按在了上横头，泥工师傅分坐两旁，师兄和我自然落坐下横头。坐哪儿不要紧，吃好吃饱才是真的。

厚道的东家给每位工匠预留了一份上梁馒头，阿公派我分送回家，晚饭前必须赶回工地。离家半月余，该给家里报个平安了，我撒着欢儿踏上回家的路。穿过村落深巷，走过阡陌乡道，无心欣赏田园春色，送完阿公、师兄家，紧着往自家赶。在墙门口就喊：“娘！娘！”母亲闻声惊喜地放下手头的活，接过上梁馒头定定地看着我，忙不迭地询问我在外学艺的日常。当母亲看到我长茧开裂的手时，突然眼圈泛红，躲进灶间。少顷，里面响起了磕鸡蛋声……

我要返回工地了，母亲包上几截青皮甘蔗塞到我手上。走出家门，母亲默默地跟了出来，低着头不住用手整理我的衣角。我劝慰母亲留步，拔腿横穿过砂石公路，向前方奔去。

忽闻母亲扯着嗓子喊：“你身子骨还嫩着，扛不动的木头别硬撑！阿公不会怪你的……”我忍不住驻足回望，在砂石公路的那一边，母亲头发纷乱，在使劲向我挥手。

成年后的我，去遥远的地方支边，上学读书，毕业后从事新的职业。当年“游荡”在匠人中间的经历，让我有幸浸润到认真做事、吃苦耐劳的底色，伴着上梁馒头那充满阳光的麦香味，成全、丰满着我的整个职业生涯。

掌故

钱茂伟

上桥，这个宁波古地名，相信大多数宁波人没有听说过，自以为熟悉宁波历史的笔者，也是最近才关注到。经过摸索，终于可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宁波曾经炽热的学区故事。

拿出民国宁波古地图，在宁波府治(今府桥街军分区)的西北隅，有一座观音寺(今西河小区内)，寺前有一条河(今西河街)，由西而东，分别有三座桥，一是顶带桥，二是西双桥，三是东双桥。双桥，就是“上桥”之音讹。乾隆《鄞县志》有“东上桥巷”“西上桥巷”可证。这一片相当于今日中山公园北边穆家巷小区、白衣小区、秀水街古街区一带，它们的东南方向是宁波府学所在地。因为近府学，所以“气象轩博”，文化气氛十分浓厚，用今日的话说，就是典型的学区房。

上桥受人关注，显然与宁波府学的设立有关。北宋真宗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，明州太守李夷庚把孔庙迁建到现今中山广场东南片的位置，殿后造明伦堂，前后有泮池，合庙、学为一。精通輿地的李太守称其为“鄞山胜壤”，并且夸下海口：“居此三十年，其嗣必大。”从宋代有关资料看，上桥片在当时并不繁荣，属于新开发区域，否则，李太守也不会说要等上30年，才会出人才。

北宋建立文官治国体系，科举逐步进入鼎盛时代。宁波开发较晚，虽说建立了庙学一体的府学，但实际上十分简陋。就全国来说，到宋仁宗明道、景祐年间，“天下文物大备，郡国学校独

未建”。宁波自然也不例外，“鄞人初未劝学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人才是如何培养的？主要靠私塾。当时宁波各地出了不少“乡先生”，譬如“庆历五先生”杨适、杜醇、楼郁、王致、王说。这些乡先生的教学活动，多在宁波各郊县。上桥陈氏的发现，让我们得以了解北宋宁波城内大家族借助私塾培养人才的情况。

上桥陈氏，或以为“鄞县翔凤乡”人。误，实际上，“翔凤乡邹溪”，仅是陈氏祖坟所在地。据北宋丰稷介绍，“陈氏为四明望族久矣，其来不可得而考”。这么说来，陈氏是一个四明旧望族，至少唐五代时就已出名了。在其后的唐末、五代动乱中，陈氏中衰。至陈招、陈延禄时，皆为普通平民，不过家中有点钱。到陈延禄子陈柯觉悟，率先散财购图书，开辟藏书室，延聘乡先生和四方之士，教授诸子弟。从有关记载看，陈氏私塾的教学质量相当高，陈柯次子陈诜中庆历六年(1046年)进士。此后，“陈氏擢第，跻通显者，世不乏人，至宋末，天下以为贤。”“垂三百年，世守不堕”，人称“上桥陈氏”。

庆历七年(1047年)，王安石任鄞县知县。次年，在孔庙基础上办县学。陈諒、陈诜兄弟从王安石游，深得王安石的欣赏。皇祐五年(1053年)，陈柯长子陈諒中进士，同年中进士的还有楼郁，这是王安石办学获得的第一批人才。

仅北宋时期，上桥陈氏就出了12个进士，南宋以后，文脉依然绵延，如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“壬戌科”进士陈晋锡，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“丁丑科”进士陈栖筠。由于缺乏宗谱、碑传资料，此后陈氏中进士情况无法详考，但肯定还有一些，因为南

宋时陈氏还有一些人为官。此外，陈氏私塾在南宋后期尚有名，塾师有“菊州单先生”等。“谏议刘汉弼、司农刘汉傅兄弟，皆学于陈氏塾者”。刘氏兄弟是上虞人，说明他们是慕名来宁波陈氏私塾学习的。

随着宋朝的灭亡，陈氏家族也逐渐衰落。南宋咸淳元年(1265年)，陈祖凭父亲的恩泽，晋将仕郎。后隐居力学，有元一代，他“讲学不间寒暑，自经史百家，下至医药、卜筮、老佛氏之书毕究”。每训子孙曰：“吾世以儒显，汝等宜守家法，无外慕，从异业，陨先闻。”由此可见，陈氏私塾至少存在到元朝。

上桥另一个著名家族是林氏。林氏祖籍山东青州，五代末，因为避战乱，林衍夫迁居鄞西桃源乡(今属海曙区)市场边，后裔在此居住下来，成为林村。后来，为避赋税，子孙四处散居。到第五代林暉时，迁居宁波城内“州治之南”。他“广植贖产，智料心计，操纵得宜，内外僮隶数百人，课役有主。间有忤意，未尝谴诃。由是，人人皆得为用，不数年，遂以富甲于鄞。”“广植贖产”用今日的话说，就是多元投资。

林暉好学，经商之余，尤其重视教育投资。他本人“折节读书，刻苦自励”“于经史百家之言，无不涉猎”。因为居丧时弄坏了眼睛，自然无法参与科举考试。宋徽宗崇宁年间，他因为羡慕上桥陈氏的成功，决定从州治南边迁居上桥。迁居后，家运更好，“生业日昌，子孙日蕃”“虽诗书未与陈氏抗衡，而饶衍丰裕则过之”。他在屋后建了私家花园，命名为植德园、经史堂、无尽庵。“聚书万卷，择贤师以教其子孙。暇日，集师友燕饮堂上，

诸孙执经满前。”他善待老师，“公见勤敏好学者，则温言辞色以勉之，故为之师者，感公诚意，无不尽力。”

宋徽宗大观初，福建人陈瓘得罪权臣蔡京，下放鄞县，别人不敢与他交往，林暉每日上门求教。回来后，将陈瓘讲的有益之语转述给儿子们听。陈瓘谪迁他郡，他仍时常通信，“问遗不绝”。

经过努力，林氏教学成果初显。长子林嵩中绍兴十五年(1145年)进士，官至清远军节度推官。林嵩子林嗣立、林嗣颖为孝宗隆兴元年(1163年)进士。林嵩六子林嗣吁有两个儿子，次子林维孝为光宗绍熙元年(1190年)进士，长子林维忠为嘉泰二年(1202年)进士。林维忠子林宗一为宁宗开禧元年(1205年)进士。林氏前后出了6个进士，成效相当不错，可称“上桥林氏”。

此外，林暉兄长林昉的儿子林尧瑞也有成绩。他父亲早卒，是母亲将其抚养长大。稍长，试入郡庠，为三生舍，性资才敏，绰有干局。楼异在宁波建造出使高丽的神舟时，招收了一批士人为干办之客，林尧瑞是其中之一。据史弥大《武翼冀志铭》载，他们“历天台，过永嘉、括苍，穷搜山谷无余蕴。泛大海，冒惊涛不测之险而归，尽得良材巨木，千章万段，殆非人力所能制，若有鬼工耶。”这段记载十分有意义，告诉我们造神舟的材料是从浙东山区砍来的，又是通过大海运回来的。

因为鄞县县学后来搬迁至月湖边，今宁波第一医院处，后人多关注月湖学区，而遗忘了曾经的府学边的上桥学区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本文的写作，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，进一步挖掘上桥学区的文化底蕴。

“碾子跟头”说碾子

老照片

桑金伟

“碾子”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解释为：“轧碎谷物或去掉谷物皮的石制工具，由碾碌子和碾盘组成。”在“百度”解释为：“主要是指用人力或畜力把高粱、谷子、稻子等谷物脱壳或把米碾碎成碴子或面粉的石制工具。”前者解释到位，后者解释不确切。碾子的主要功能是轧碎和去皮，而不是磨面粉。

上述是我国北方和西部普遍使用的碾子，而本文要说的是过去浙东一带更普遍的碾子。两者在形态上有较大区别，机械原理和功能则是一样的。

先讲磨和碾的区别。本地老人有话：“横称磨，竖称碾”，简说是“横磨竖碾”。它很生动地说明了磨和碾形态上的区别：磨是圆形厚石片横向水平地转动,利用两个圆石平面之间的摩擦与压力而研;碾是一个圆形碌子或者一片较薄的圆石,纵向垂直地转动,利用的是圆周边的摩擦与压力而轧。磨,研出的是细粉;碾,轧出的是粗粒。谷物要深加工时,总是要先碾后磨。磨一般是用人力推动;碾既有人力,也有畜力驱动。磨不管是裙磨还是沙筛磨都要放在磨架子(或桌子)上使用;碾必须在碾盘(或碾台)上使用。因占用空间不同，磨一般放在室内，碾往往置于户外。

再讲南北方两种碾的区别。南方常见的是槽碾，北方使用的是罗碾。主要区别就在于“槽”和“罗”。槽就是在碾盘（或碾台）上开个凹槽，“碾饼”（相当于碾碌）在凹槽中转动。罗就是在碾盘（或碾台）无凹槽的平面上，用碾碌直接滚。槽碾的规模大于罗碾，加工量也比罗碾大。槽碾的“碾饼”转动必得使用畜力，而罗碾多用人力，在北方碾麦什么的，妇女也能完成。

槽碾建造难于罗碾，罗碾只需要一块圆形平面的石座就好，其半径略大于碾碌的长度。而槽碾，难就难在石碾槽的筑造和“碾饼”的凿制。石碾槽是嵌埋在地里的一个较大而封闭的正圆圈，它由十几节弧形石条分别镂凿开槽而成，每节长度、弯度相

等，均为这个正圆圈的n等分。每节紧密相接后，便在地上形成一个封闭的有槽平滑相连的石圆圈。建造石碾槽需要预先准确设计和计算，否则无法并成平滑的正圆。

与石碾槽相配的是石“碾饼”，因其形似大饼，家乡人称其为“碾饼”。石碾饼能在碾槽内灵活转动，据大人讲，在槽中均匀地放好谷物等，牛拉着碾饼碾转其上，用来脱壳。一般的碾子一次能碾稻谷100多公斤，耗时近1小时。

旧时，碾、磨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几乎是“无碾无磨不成村”。现在去乡村偶尔还能看到废弃在角落无人问津的石磨，在北方偏远小村尚有罗碾使用，然而槽碾绝迹已成定论。我外婆家边上曾有一台槽碾，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孩提时，这台槽碾已遭废弃，碾边的牛屋也歪倒了，成了我们玩耍的地方。现今这里只留下一条叫“碾子路”的小道。

1986年出版的《慈溪县地名志》中载有两个“碾子跟村”，分别在师桥镇和天元镇；一个“碾子头村”在白沙镇。在宁波市北仑区大碇街道青林村也有个叫“碾子跟”的自然村。在余姚市102路公交车线上有个叫“碾子头”的站，想必原也是小村的名。北方这类村名更多，如山东省即墨市大信镇下有个碾子头村，我曾去过。说明过去碾子很多、很重要，且常成为地标。

对碾子最留恋的，可能要数原天元镇的碾子跟村了。现在天元镇已撤，并入周巷镇，碾子跟村也撤了，并成界塘行政村。当您走到这个村村口时，会看到两块“碾饼”并立在台基上，犹如古战车的两个轮子。台基正下方凿着“清初碾子”四个大字。这300多年前的碾子俨然成了此村的标志和村民的骄傲。

为碾子立碑这件事还得从卢万良说起。在村里开小店的卢万良是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，与自己的前辈们一样，卢万良从小伴着碾台长大，虽然碾子早已废弃不用，但碾台是他儿时玩耍的场所，他对碾子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这个村原有两台槽碾，20世



①北方的罗碾。摄于山东淄博。②散落在野郊的槽碾台遗存。摄于江西省安义县石鼻镇京台村。③慈溪碾子跟村陈设的碾饼。（桑金伟 摄）

纪90年代，碾坊被拆毁，组成碾子的主要部件碾槽被移用于建造桥墩，两块“碾饼”被抛入河中。这一切让卢万良感到可惜。

1999年的一天，卢万良征得村负责人的同意和支持，请来几位大汉，好不容易将重逾千斤的碾饼从河底捞了上来，把它们端正正供奉在村口。作为一个普通村民，卢万良虽然不清自己这样做的意义，但他认定此举是有价值的。

这几年我到处奔波，用镜头记录即将消失的民俗，这期间就很留意对槽碾的收录，希望能拍到一张反映全貌的照片，但求之不得。

余姚大隐是浙东有名的石料、石用具产地，得悉那里有一

个叫“庙跟”的村子还保留着碾子，于是急急赶去，只见碾台已成一片菜地。村民指点说，另一个不远的偏僻小山村可能还有碾子，又匆匆前往，发现碾台被拆，碾饼敲碎后铺了地，只剩一些碾槽散片堆在那里。拍摄了几张照片，聊作残缺的回忆。

南方的槽碾不但常碾谷、麦，还碾菜籽、棉籽以备打油用，因此旧时的油坊里，碾子是必备的。据老人回忆，慈溪老浒山东门有个较大的油坊，备有两台碾子，又配了四头大水牛。旺季时，两台碾子不停地转，四头大水牛轮番上场，伙计们拿了碾碎的菜籽、棉籽压榨菜油、花油。这番景象恐怕只有在昔日江南才能见到。

甬城绘·名人故居

徐时栋故居

徐时栋（1814年—1873年），字定宇，一字同叔，号柳泉，学者称“柳泉先生”，清鄞县人。1846年中举人，两赴会试不第即不复应试，后以输饷授内閣中书。

徐时栋生平酷爱读书，留意搜罗，建烟屿楼于月湖西，藏书6万卷，1863年毁于火。他一生校勘文献甚多，尤致力于地方文献，校刻宋元《四明六志》，考异订讹，著《四明六志校勘记》，使六志得以流传后世。曾主四明文坛30余年，1868年，受聘主持鄞县志局，充分利用了家藏图书。60岁时积劳成疾，临终将修志事托付好友董沛。志成，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刊行，称光绪《鄞县志》。

徐时栋故居位于月湖西岸共青路，现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（丁安 绘）